

清朝的治疆政策与成效

□ 许建英

1759年，清朝统一天山南北，宣称“准噶尔荡平，凡有旧游牧，皆我版图”，其地域包括天山南北、阿尔泰山东西以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清朝治疆大致可划分为前期（1759—1825年）、中期（1826—1883年）和后期（1884—1911年），分别经历了创制、平乱和建省等阶段。清朝汲取历史经验、创新治理制度、不断改进措施，在各个时期因应治理需求，在政治、经济、司法、军事、财政、宗教等各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和政策，呈现出鲜明的特点，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政治方面，新疆实现从军府制度到行省制度。1762年，清朝决定在新疆实行军府制，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统辖新疆军政事务。伊犁将军下设都统、参赞大臣、办事与领队各级大臣，分驻全疆各地，管理地方军政事务。在军府制下，清朝根据新疆各地情况实施不同的民政治理制度，在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沿用伯克制，但是废除伯克世袭制；对哈密、吐鲁番等地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土尔扈特诸部以及察哈尔蒙古则实行扎萨克制，封王赐爵；在乌鲁木齐、巴里坤和古城等汉族聚居地实行郡县制。1878年左宗棠消灭阿古柏收复新疆后，清政府于1884年建立行省制。巡抚为新疆最高行政军政长官，下设道、府、厅、州、县等行政机构；裁撤参赞和办事大臣，废除伯克制，削弱扎萨克制权限，蒙古等游牧民族事务归地方政府管理。军府制下这些多元化的扎萨克制、伯克制和郡县制等制度，是在传统制度基础上移植或改进而来，不过这些制度并非简单继承，而是得到了改造和完善，体现出创新性。例如，扎萨克制度原本用于喀尔喀蒙古，反映着满蒙贵族的独特关系，而清朝转用于哈密、吐鲁番等地维吾尔族；伯克制度经过改造后则转化为清朝的流官制度。新疆设立行省制度是西汉以来历代中央政府经营西域的结果，是清朝治疆的创新，也是历史性的变革。清政府改军府制为行省制，使西

汉以降治疆制度发生历史性变革，实现了新疆与中原地区政治制度一体化。在经济方面，清政府在新疆兴办屯垦、发展经贸。清朝制定屯垦措施，推动新疆屯垦多样化，诸如实施兵屯、民屯、回屯、旗屯和犯屯等，形成远超历代的完整屯垦体制。清朝屯垦以北疆为主，屯垦遍布全疆各地。建省后新疆制定《新疆屯垦章程》，鼓励军民屯垦，促进了农业恢复与发展。此外，清朝注重发展新疆贸易，支持与内地通商，简便征稅手续，降低稅率，大大推动与中原地区贸易。同时，清朝还制定对外贸易章程，开展与哈萨克、布鲁特、浩罕等部、沙俄和英国的贸易。清朝的经贸措施促进了新疆经济发展，奠定了治理新疆的物质基础。

在司法方面，清政府在新疆构建起国家主导的法律与法治体系。首先，清朝重视国家法制统一，在新疆推行《大清律例》和《理藩院则例》，重大案件及刑事案件必须依国家法律审判。其次，清朝因地制宜根据新疆具体情况制定法规，例如《新疆条例》和《回疆则例》等。再次，依照“从俗从宜，各安其习”原则，清朝保留新疆部分地方习惯法和宗教法。此外，新疆建省后废除南疆的按丁抽稅制，实行按田地征稅制，与内地賦稅统一。清朝在适当保留地方习惯法的同时，逐步将新疆纳入国家法律与法治体系中，构筑起治疆的法治基础。

在军事方面，清政府构建起西北国家安全体系。首先，新疆边防驻军常备化。新疆统一时，驻防北重南轻，分为驻防兵与换防兵。19世纪20年代后，和卓后裔接连叛乱，清朝加强回疆驻防兵。其次，构筑边境守卫、交通及通信体系。清朝建立边境卡伦与巡边制度，建设军台、驿站、营塘网络以及与内地驿站线路，全疆有160个军台、9个驿站、24个营塘，军台数量居全国之冠。此外，清朝注重以羁縻手段经营藩属，给予其政治、经济上的优待和赏赐，建立周边安全体系。

在财政方面，清政府实行协饷制

度。清朝新疆所征賦稅多为粮食，可解决驻军和政府人员吃粮问题，但各级政府开支及军队官兵俸禄缺口甚大。清朝采取内地各省关分攤、定额补助方法来解决新疆财政困难，是为“协饷”制度。清朝规定，将新疆所需协饷分攤给内地各省区和海关，定期拨解新疆。当时共有25个省区分攤新疆协饷銀两，后来江汉关、闽海关、江海关和粤海关等也分攤新疆协饷。此外，清朝还拨专款用于新疆平定叛乱等重大事件。协饷制有效地维护了新疆军政运转、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在宗教方面，清政府在新疆实施多种宗教共存的政策。清朝保护新疆多种宗教并存，伊斯兰教、佛教、道教、萨满教和中原地区的地方宗教，甚至西方的基督教和沙俄的东正教在新疆都有传播，新疆多种宗教信仰共存的特点日益突出。

清朝治理新疆历经152年，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的问题和挑战，创设和完善治理制度和政策，整体上呈现出注重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治疆制度具有多元性、继承性与创新性，治疆政策的针对性较强，治疆重视法律建设等特点，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

有效地维护了新疆稳定和国家统一。清朝早中期治疆实行军府制下的多元治理模式，采取郡县制、伯克制和扎萨克制，其核心是确保制度统一、政令统一、维护中央权威和国家统一。军府制保证了新疆近70年稳定与发展，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保证了西北的安全。1884年新疆建立行省系重大变革，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与巩固来看，具有深远意义和重大历史影响，堪称历代中央王朝治疆的历史归宿。道光朝后新疆内忧外患加剧、社会动荡，但始终维系于祖国大家庭中，说明清朝治疆整体政策是有效的。

促进了新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清朝重视新疆水利建设和屯垦事业，农业生产成效较大，为统一新疆和治理新疆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清朝在新疆屯垦形式灵活多样，同时为适

应屯垦需要，东北、蒙古以及中原地区人口移民新疆，大大促进了新疆与全国其他地区以及南北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奠定了新疆多民族的谱系。内外贸易的拓展丰富了新疆各族人民生活，有助于新疆社会的发展。清朝采取众多措施，建设和改善新疆境内交通、通信设施，建立连接内地的道路体系，规划与建设了众多的边疆城镇。这些措施在早、中期稳定了新疆与周边汗国、部族的关系，加强了边防安全；后期则增强了抵御外部侵略能力，有效抵御了英俄等列强蚕食。此外，这些交通、通信设施以及城镇建设也促进了新疆经贸发展和社会进步。

实现了对新疆社会的有效治理。清朝新疆宗教多元化政策有利于多民族社会的稳定，伊斯兰教政教分离改革符合社会发展潮流，有利于社会治理。清朝将新疆纳入国家法治体系，突出了依法治疆，规范了回疆（清朝对新疆天山南路的通称）治理，维护了国家权威，是新疆与内地法制一体化的标志。在治乱上，清朝坚定不移地打击大小和卓后裔的系列叛乱，使和卓家族最终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肃清了其影响。这是清朝治疆史上的重大事件，意义深远，有力维护了新疆的稳定。

需要强调的是，清朝在统一和治理新疆过程中，众多文人、官员和被发配者考察和研究新疆，推动了新疆文化发展。清朝还组织撰写众多新疆史志，掀起西北輿地学研究，大大推动中原地区对新疆的认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



俄罗斯汉学家穆凤玲：让俄语世界更好了解当代中国

□ 王建丽

穆凤玲（Olga Migunova），俄罗斯当代杰出的汉学家、翻译家、出版家，哲学博士，现任圣彼得堡国立经济大学中国与亚太地区研究中心主任、俄中友好协会圣彼得堡分会副主席。穆凤玲对孔子及儒家思想有深入研究，并长期致力于中俄出版界和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积极推动两国文化的相互理解与融合。她不仅帮助俄罗斯及中亚国家的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更让他们在新时代背景下领略到中国思想与精神的博大精深。

以译为介，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穆凤玲精通中文，其译作以优美而准确著称，参与翻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等重要文献俄文版的翻译，翻译出版《晚唱》《最慢的是活着》《远河远山》《外省书》等多部文学作品。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俄语翻译，时任中央编译局俄国专家的穆凤玲分享了她对大会报告的深刻印象和翻译过程中的感受。她对中国在短短数十年间取得的卓越成就感到由衷惊叹，说道：“30年前的发展水平与今天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穆凤玲表示，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充满了生命力与能量，极大地激发了译者的工作热情与创造力，使她在翻译过程中高度投入，甚至达到了忘我的境界。翻译如此重要的报告，不仅需要精通中文，还要求

对中国独特的现象、重大事件、历史脉络以及政策战略有深入的理解。她讲道，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常常引经据典，因此译者需要熟悉古代汉语和谚语。为了理解某个历史名词，她时常需要在图书馆翻阅很多资料。

她特别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报告中一个重要亮点，这一思想不仅对国家的发展意义重大，当时也引发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浓厚兴趣和期待。此外，穆凤玲对中国共产党严格的纪律表示钦佩，认为这种纪律是政府高效执行力的重要保障。谈及中共十九大对中国发展所带来的深远影响，穆凤玲和众人一样，满怀期待相信大会会为人民带来美好生活。她观察到，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体现在日常穿着的变化、餐馆的人潮涌动以及街头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这一切都显示出中国人民生活的安乐和富足。这一切成就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国家的战略方针密不可分，她为能够参与这一重要翻译工作感到自豪。

在中国多年工作的经历，让穆凤玲见证了中国的蓬勃生机，使她深刻体会到普通百姓的生活与梦想。在新时代新思想的感召下，她始终坚持客观准确地分析、阐释和理解中国，通过翻译积极向世界传递着真实的中国故事。通过她的努力，更多人得以感受到中国的温暖与活力，了解这个伟大国家所蕴含的无限可能和希望。

以古察今，探究当代中国的传统文化根源。穆凤玲长期致力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研究，并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和认识。穆凤玲认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植根于中国人民内心的文化基因，孔子的一些主张依旧深刻影响着当今中国社会。比如，儒家思想宣扬对知识的推崇、对长者的尊重、对社会成员的宽容。当今中国提倡的和谐社会理念，便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穆凤玲还注重从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对话角度理解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她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驱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动力，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儒家思想的精髓相结合，是促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因素。

穆凤玲认为，孔子的哲学理念尤其是儒家思想中的和谐理念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在她看来，儒家思想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其中蕴藏着解决当代全球性挑战的重要启示，因此能够吸引来自不同地域、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深远影响。

当今中国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便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穆凤玲说：“《论语》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在全球化时代，全人类命运与共，风险共担。”“我们应当从中获得启发，通过贸易、旅游、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合

作，增进国家间、民众间的友谊，实现更多面对面、心连心的沟通，让积极的正能量循环往复。”

以邻为伴，中俄友谊培育青春力量。作为俄中友好协会圣彼得堡分会副主席，穆凤玲特别关注青年人才的培养与交流，积极组织中俄高校之间的教育、文化以及留学生互换等国际交流活动，推动学术成果合作，为中俄关系的高层次发展贡献力量。

在两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中俄人文教育领域的合作正在逐步深化。目前在俄罗斯已有超过200所高校开展汉语教育，约有9万名大中小学生学习中文。俄中友好协会还经常举办丰富多彩的夏令营和中国文化体验活动，进一步加深了俄罗斯青年学子对中国的认识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向往。

谈到中俄两国青年之间的友好交往前景，她激动地说道，“文化交流就要从年轻人开始，他们朝气蓬勃、精神焕发，是民心相通的有力传递者。我会一直为增进中俄两国人民的友谊努力奋斗，尽管中国的发展和世界局势正在变化，但是我相信中俄世代友好的深厚情谊永远不会变”。



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不同文明之间只有交流互鉴、相互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力。在人类古代文明史上，西方古典文明在形成、发展与演变的过程中，便曾与古代近东文明产生了较为广泛的交往与融合。

西方古典文明指的是古希腊文明与古罗马文明，这两种文明之所以被称为“古典的”，在于古希腊文明被视为西方文明的源头，而古罗马文明则吸纳了周边诸多文明成果并成为希腊文明最直接的传承者，故而它们才被后世合而观之地称为“西方古典文明”。国际史学界所说的“古典学”（classics），其研究对象即为以希腊文、拉丁文为载体的希腊—罗马文明的各个方面。而上起公元前四千纪（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3001年）的古代近东文明，除两河流域、埃及外，还包括米坦尼、赫梯、埃兰、乌加里特以及波斯等诸多文明，形成了东地中海文化区。

西方古典文明与古代近东文明的交往，大约始于公元前二千年（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001年），即古代希腊历史上的克里特文明时期，至近东诸古代文明相继衰落前，即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东征前，相互交往断续达16个世纪。一般而言，这种交往——无论是近东各文明内部，还是与西方古典文明之间——常常源于利益的驱使，自然与大小不一的冲突相伴，但不可避免地也在文化上也产生了不同的相互影响。尽管所起的作用在程度上各有所异，但是不同文明间确实存在互动融合和相互影响，即便在所谓的“希腊化时代”，希腊文化在近东地区广泛传播过程中也深受当地文化影响。

就古代希腊而论，从时间上讲，其早期历史经历过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荷马社会、殖民运动以及古风时代。此间与古代近东诸文明的交往，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形式上以商贸、殖民为主线，而人员的流动所带来的文化影响也集中表现在建筑风格、神话传说、宗教信仰以及语言文字等方面。例如，希腊克里特迷宫的廊柱设计即受到埃及建筑的影响，进而在历史时期演化为承载希腊人的精神观念、表现希腊人审美取向的神庙建筑样式；荷马史诗中有关在战场上焚祭希腊阵亡将士的记载亦见小亚细亚赫梯文明的旧俗。在古风时代，亦即希腊文明的初始阶段，希腊字母文字的出现定年上虽有“公元前8世纪早期说”与“公元前8世纪晚期说”，但源自腓尼基（今天的黎巴嫩）字母文字却是不争的事实。若由此前推，腓尼基字母则源自西奈字母；作为古代迦南地区闪米特语言的书写系统，西奈字母的起源又受到古代埃及象形文字的影响。

《剑桥古代史》卷四序言指出，由古风时代向古典时代过渡的“标志是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与希腊诸邦冲突的重大事件，这些事件使希腊人的自由观念与异族的专制观念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而面对波斯人的入侵，希腊人并未屈服，而是战胜了异族专制统治的企图，并成就了古典时代的辉煌。古典时代末期，亚历山大的征服活动及其继承者的继续东进，将西方古典文明的

空间范围拓展至近东乃至中亚。这不仅开启了崭新的希腊化时代，而且进一步扩大了希腊文化的影响。在托勒密王国，埃及祭司曼涅托不仅“深谙希腊文化”，而且用希腊语完成了《埃及史》的写作，其中“针对埃及历史的记载，他批驳了希罗多德因无知所造成的诸多谬误”。随着希腊化王国对中亚的征服，希腊的造像艺术影响了当地的艺术表现形式，并逐渐发展为佛教艺术史上影响深远的“犍陀罗艺术”，诸如赫拉克勒斯这样的神话英雄也被吸纳、改造成为当地艺术主题中的形象。在中亚的阿伊—哈努姆（Ai Khanoum），以希腊语为载体的“七贤箴言”则从德尔夫传送到该地，并被镌刻在圣地。除了希腊文化与当地文化的融合外，在政治制度层面上，亚历山大身后留下的希腊化王国也适应了当地的传统，如托勒密王室的法老化，塞琉古王国的基层社会组织其实也保持着当地的传统结构模式。因此，所谓“希腊化”，是希腊文明与东方文明在碰撞过程中的再度融合。至于“希腊化时代”这一年代学框架，其实夸大了希腊之于东方的影响，实际上应该

古代近东文明的交往与融合

□ 张强

西方古典文明与

是地中海世界的“全球化”。

至于西方古典文明中的罗马，它从公元前3世纪末在环地中海地区逐渐建立起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在公元2世纪初所建行省多达40个，各文明间的交往达到鼎盛。地中海在当时罗马人的眼里已被视作“我们的海”（Mare Nostrum），其政体形式、行政组织、法律体系等最终成为一种独特的文明形态，并作为拜占庭（即东罗马帝国）文明的一部分传到中世纪。值得注意的是，学界所称的“罗马化”旨在讨论各行省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尤其是罗马文化在行省的传播与影响。但是，这种传播与影响也有其局限性，在不同行省也都呈现出形态不一的地方性特点，尤其是维持着城邦自治传统的希腊地区。

由此可见，西方古典文明与古代近东文明的交往为地中海诸古代文明的融合提供了历史途径。但所谓“融合”并非文明的同质化，而是相互吸收和化用彼此的某些先进文化元素为已所用，从而形成共生的态势。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诸文明间出现此消彼长的情形，但从较长时段的历史来看，这些古代文明间互益与共存现象则是显而易见的。

自20世纪晚期起，中外学界已不仅仅局限于“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赫梯文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等个案研究，而是把上述诸文明作为整体加以考察，以更广阔的视野解读西方古典文明与古代近东文明的交往与融合。究其目的无非是，一方面要探究古代诸文明在各自历史进程中呈现出的特性，另一方面则要把握人类诸文明早期发展中的共性，进而探寻文明多样性对推进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

从西方到东方，历史在交往与融合、统一与分裂中不断生成演进，其“古典”政治的发展进程，最终走向汇流。正如林志纯先生在中西古典学研究成果中所展示的那样：就总的发展趋势而言，旧大陆的古代国家形态大都经历过从城邦到区域王国、复至帝国的过程，而中西诸古代文明发展的具体历史道路却大相径庭，这便造成了中国古典文明的长期延续，西方文明则经历了由古典时期而中世纪的阶段性发展。

（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史研究所所长）

